

北魏道武帝早年经历论考

孙 险 峰

1 序论

北魏是鲜卑人拓跋珪创建的少数民族政权，其前身为西晋册封的代国。晋孝武帝太元元年（376）12月，拓跋珪6岁时，代国被前秦所灭。登国元年（386）正月，拓跋珪在牛川重建代国。由于史书记载他从代亡至重建代国的9年时间里，其活动情况疑窦丛生，从而成为历史悬案。目前的史学界，基本上对此有两种不同的思想倾向。王仲荦认为代国被前秦灭亡以后，拓跋珪依然滞留在北方的独孤部和贺兰部，其史料主要来源于《魏书·太祖纪》等。^[1]李凭认为代国被前秦灭亡以后，拓跋珪和其祖父代王什翼犍被带到长安，其后拓跋珪又被短暂地流放到蜀地，其史料主要来源于《晋书·苻坚载记、上》等。^[2]

由于道武帝在这期间里，究竟生活在何处的历史意义非常重大，所以本论借助先哲先贤的研究成果，以道武帝的人生早年经历（时间）为主线，以他每段时期生活的地域（空间）作为考察范围，再与他能够取得政权的结果（政治）相印证，通过三方面的文献梳理，谋求揭示道武帝的早年经历。

2 代王的生死与道武帝发配蜀地

根据《魏书·序纪》记载：“（建国）三十九年（376），苻坚遣其大司马苻洛率众二十万及朱彤、张蚝、邓羌等诸道来寇，侵逼南境。冬十一月，白部、独孤部御之，败绩。…帝时不豫，群臣莫可任者，乃率国人避于阴山之北。…十二月，至云中，旬有二日，帝崩，时年五十七”。关于代王的死因，《魏书·昭成子孙·寔君列传》记载，由于代王之弟拓跋孤曾经让国与他，于是代王为感谢而分给拓跋孤一半的国家。当拓跋孤死去后，代王收回其统辖权，因此，拓跋孤子拓跋斤怀恨在心并伺机作乱。当苻洛攻伐代国时，拓跋斤挑拨代王子寔君，说代王将要王位传给慕容皇后所生的儿子，又要杀你，我很可怜你，所以告诉你此事。因寔君受到拓跋斤的唆使，故而产生了叛逆之心，于是将代王及诸王子杀害。代

王被杀以后，代国陷入一片混乱。由于此时前秦讨伐代国的军队停留在“君子津”，^[3]“其夜，诸皇子妇及宫人奔告苻洛军。坚将李柔、张蚝勒兵内逼，部众离散（《寔君列传》）”。战争结束以后，“苻坚闻之，召燕凤问其故，以状对。坚曰：‘天下之恶一也’。乃执寔君及斤，輶之于长安西市（《寔君列传》）”。《北史·魏诸宗室·寔君列传》和《资治通鉴·晋纪二十六》，也有上述的记载。因此整个战争的时间、地点、主要人物、经过和结果，看起来并无疑问。

但是，另一方面，《晋书·孝武帝纪》记载：“（376年）十二月，苻坚使其将苻洛攻代，执代王涉翼犍”。这是在《晋书》的本纪当中，明确记载俘虏代王至长安，并没有死在云中。《晋书·苻坚载记、上》记载：“翼犍战败，遁于弱水。苻洛逐之，势窘迫，退还阴山。其子翼圭缚父请降，洛等振旅而还，封赏有差。以翼圭执父不孝，迁之于蜀。坚以翼犍荒俗，未参仁义，令入太学习礼”。而且，《宋书·索虏传》记载：“什翼犍勇壮，…其后，为苻坚所破，执还长安，后听北归。犍死，子开字涉珪代立”。此外，《南齐书·魏虏传》记载：“太元元年，苻坚遣伪并州刺史苻洛伐犍，破龙庭，禽犍还长安。为立宅，教犍书学。…坚败，子珪字涉圭，随舅慕容垂居中山，还领其部，后稍强盛”。^[4] 这三部文献一致记载，代王被前秦俘虏后来到长安。由此可见，《魏书》与《晋书》《宋书》《南齐书》之间，只有该年11月前秦讨伐代国，12月战争结束之事基本相同。但主要有三点不同：其一，代王死于漠北，还是被带到长安。其二，寔君的“弑父”，道武帝的“执父”，以及是否被发配到蜀地。其三，代国灭亡以后的道武帝，是继续留在了漠北，还是被迁往长安。下面对这三点疑问进行考察。

其一，代王死于漠北，还是被带到长安。

首先周一良和李凭认为，记载北魏早期历史的史官，因为担心直笔获罪，所以不敢直书代国被前秦灭亡的耻辱史籍，故改用曲笔记载代国的早期历史。^[5] 而这一见解，主要依据唐·房玄龄《晋书》、梁·沈约《宋书》、梁·萧子显《南齐书》。从这三部史籍记载代国的情况来看，并非出自同一史官之手，也没有原封不动地照搬前朝文献，其记载方式也有差别。比如，《晋书》称呼道武帝为“翼圭”、《宋书》为“涉珪”、《南齐书》为“涉圭”，《晋书》记载苻坚让代王“习礼”、《宋书》记载代王“北归”、《南齐书》记载“为立宅，教犍书学”。所以这三种文献各有自己的侧重点，并没有完全沿袭前朝的文献。而且，记载这三部文献的史官，与前秦和代国都没有直接关系。由于史官是站在第三者的立场，所以不需要曲笔，也不会担心直笔获罪被杀，更没有必要掩盖代国的耻辱历史。而作为北魏的史官，在记载本朝早期历史时，有可能担心直笔获罪被杀，故而掩盖历史。北魏著名的政治家崔浩，正是因修国史成为被杀的导火索。^[6] 特别是《魏

书·苻健·苻坚列传》，本应该详细地记载这次战争的首尾，因为这是改变代国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，可是该《传》却对此事一字未留，实在过于蹊跷。所以代王是否死于漠北尚难以断定。

其二，寔君的“弑父”，道武帝的“执父”，以及是否被发配到蜀地。

前文《寔君列传》记载，代王是被寔君所弑，寔君又被苻坚车裂而死，可是南朝史籍根本没有记载此事。而且如果寔君被带至长安车裂而死，《晋书》也没有必要，让道武帝背上“执父不孝”的罪名。即使苻坚不经过任何调查，也不可能把6岁的道武帝，与成年的寔君二者混淆。况且，弑君是历史上的大事件，南朝的史官怎能不特书一笔。相反，却记载代王被抓到长安，又“令入太学习礼”，这与《魏书》记载的整个事件难以吻合。所以《魏书》记载寔君“弑父”，必然有不为人知的内情。而《晋书》记载道武帝“执父”，也应该有特殊的背景。但两种文献都没有离开焦点人物——代王，代王的生与死，也就成为判断文献是否可信的依据。虽然目前还没有其它资料，证明代王被俘长安，但道武帝不在漠北是可以确定的（见下文）。如果道武帝不在漠北，被前秦带至长安，代王也被带到长安的可信度就会增强。如果代王来到长安，寔君“弑父”的记载，则不能成立。而道武帝“执父”是替人受过的观点，^[7]也就在情理之中了。

此外，年仅6岁的道武帝，是否被发配到蜀地，应该从以下几点考虑：（一），代国初灭，一个没有政治前途的王孙被发配到蜀地，一定凶多吉少。（二），因为道武帝有很深的汉文化素养，如果去了蜀地，没有人照顾他，学习汉文化的机会变得更加渺茫。^[8]（三），被流放的人，如果没有皇帝的赦免，擅自回来，一定是死罪。（四），苻坚善待代国王臣，以礼仪教化他们，是前秦对待周边部族的政治策略。可是，却又只惩罚6岁的道武帝一人去蜀地，很不符合逻辑。特别是父母爱其子是人之常情，如果将如此年幼的孩子独自发配到蜀地，必然起不到安抚代国王臣的政治效应。（五），《晋书》、《宋书》、《南齐书》都误认道武帝为代王之子，这很可能是他们长时间生活在一起的缘故，所以才引起误解。相反，如果道武帝去了蜀地，便不可能在一起生活，也就不会产生辈分方面的误解。（六），《晋书》记载道武帝发配到蜀地一事，很可能其后得到苻坚的赦免，《宋书》《南齐书》才没有连续记载此事。^[9]所以，道武帝去蜀地的可能性很小，更不可能在蜀地长时间地生活。

其三，道武帝在代国灭亡以后，是继续留在漠北，还是被迁往长安。关于这个问题，将在下面继续考察。

3 道武帝不在漠北考

《魏书·外戚·贺讷列传》记载：“昭成崩，诸部乖乱，献明后与太祖及卫、秦二王依讷。会苻坚使刘库仁分摄国事，于是太祖还居独孤部”。即代国被灭以后，道武帝与母亲及卫、秦二王去了贺兰部避难，此后道武帝又去了刘库仁的独孤部。《魏书·刘库仁列传》还记载：“建国三十九年，昭成暴崩，太祖未立，…于是献明皇后携太祖及卫秦二王，自贺兰部来居焉”。这条文献与上文不同的是，由道武帝独自去独孤部，又变成四个人一起来到独孤部。所谓“卫秦二王”，《昭成子孙·秦王仪列传》记载：“子仪…太祖幸贺兰部，侍从出入。登国初，赐爵九原公。…寻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左丞相，进封卫王”。另一位是“秦王觚”，《秦王觚列传》记载：“烈弟觚，勇略有胆气，少与兄仪从太祖，侍卫左右”，也就是与“卫王仪”同时期跟随的道武帝。但问题是，贺氏四人离开贺兰部转赴独孤部，远离自己的母家，更处于危险的境地，这样的做法有悖常理。特别是他们四人从代国初灭，到道武帝重建代国前夕期间，并没有往返于各部落之间的详细史籍。所以，道武帝是否生活在漠北还无法断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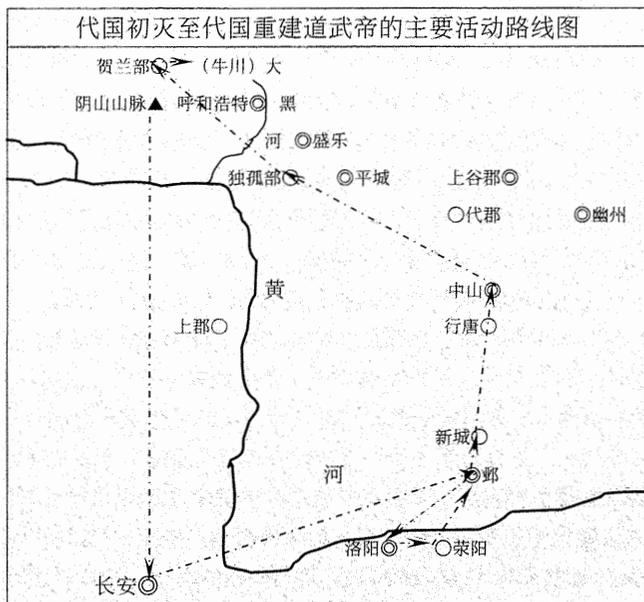
此外，如果在危难之时，贺氏带着其子道武帝亡命尚在情理之中，可是带着“卫秦二王”一起逃命，又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因呢？《贺皇后列传》记载：“后，后少子秦王觚使于燕，慕容垂止之。后以觚不返，忧念寝疾，皇始元年崩，时年四十六”。即“秦王觚”为贺氏之子。而秦王觚被慕容垂之子慕容普麟杀害后，道武帝的态度是：“慕容普麟既自立，遂害觚以固众心。太祖闻之哀恻。及平中山，发普麟柩，斩其尸，收议害觚者高霸、程同等，皆夷五族，以大刃锉杀之。乃改葬觚，追谥秦愍王（《秦王觚列传》）”。如果说秦王觚是贺氏之子，也就是道武帝之弟，但是按照《序纪》的记载，道武帝是献明皇帝的遗腹子，又何来之弟呢？唐长孺校勘的《魏书·昭成子孙列传》校勘记〔二〕认为：“当是献明太子拓跋寔死后，贺氏收继为（拓跋）翰妻所生”。^[10]但是，《魏书》没有记载贺氏收继秦王觚的文献。而且，既然秦王觚不是贺氏所生，贺氏又为何思念养子忧愤而死。特别是道武帝对杀害秦王觚的人，痛恨到了极点，说明他们的感情之深非比寻常。宋·袁枢《通鉴纪事本末·拓跋兴魏》卷十六下记载：“（晋孝武帝太元13年）秋七月，魏王珪遣其弟觚觐见於燕，燕主垂衰老，子弟用事，留觚以求良马，魏王珪弗与，遂与燕绝”。袁枢也认为秦王觚是道武帝的弟弟。并且，秦王觚被慕容垂扣留时，“觚因留心学业，诵读经书数十万言（《秦王觚列传》）”。道武帝在代国初亡时，已经自身难保，比他还小的秦王觚，又是在何处学习的经学典籍呢？如果代亡以后，依然生活在漠北，学习儒学的机会，必然受到很大的

限制。所以，他们很可能被带至长安，才有机会学习儒学，也由此结识了慕容垂，并作为使者出使后燕。而在此之前，卫王仪也曾经出使过后燕（《太祖纪》）。选择他们作为使者，也是与慕容垂相互之间熟悉的缘故吧！特别是此时为登国5年，道武帝年仅20岁，比道武帝还小的秦王觚，能“诵读经书数十万言”，在游牧部落里，恐怕不能只用“罕见”二字形容，而“（慕容）垂之国人咸称重之（《秦王觚列传》）”，也正表明游牧民族的汉文化水准非常落后。所以虽然道武帝与秦王觚不是同父所生，但应该为同母的兄弟关系。而慕容普麟杀秦王觚，也是不向道武帝示弱的表现。否则，慕容普麟杀害与道武帝关系不密切的人，和道武帝极度愤恨慕容普麟及其同党杀害秦王觚一事，便自相矛盾了。

而且，道武帝回归漠北来到独孤部时，其首领刘显将要谋害他，当道武帝逃离独孤部以后，贺氏又担心刘显追赶，《贺皇后列传》记载：“后乃令太祖去之。后夜饮（刘）显使醉。向晨，故惊厩中群马，显使起视马。后泣而谓曰：‘吾诸子始皆在此，今尽亡失，汝等谁杀之’”。这里说到“诸子”，也就是贺氏并非只有道武帝一子。既然道武帝是长子，又是遗腹子，贺氏又与谁生下这些孩子呢？道武帝之父去世以后，代王时年51岁，仍然具备生育能力。其母贺氏当年22岁，也适合于再嫁的年龄。而部落之间的联姻，是巩固政治的基础。所以贺氏再嫁代王的可能性最大。^[1]而且，《晋书》《宋书》《南齐书》都认为代王和道武帝是父子关系，贺氏其后所生之子的年龄比道武帝略小一些，从而导致道武帝和他们，对代王的称谓趋于相同，或许这也是南朝史籍产生误解的原因。

此外，由于“庠仁子显杀畜而代之，乃将谋逆（《太祖纪》）”，道武帝不得不逃离独孤部。《献明皇后列传》也记载：“刘显使人将害太祖，…后乃令太祖去之。…故显不使急追。太祖得至贺兰部”。《长孙高列传》还记载：“刘显之谋难也，嵩率旧人及乡邑七百余家叛显走”。《穆崇列传》记载：“太祖之居独孤部，崇常往来奉给，时人无及者。后刘显之谋逆也，…崇来告难，太祖驰如贺兰部”。这些文献都可以证明，道武帝为了逃避刘显的谋杀而奔赴贺兰部。并且，《太祖纪》还记载：“庠仁常谓其子曰，帝（道武帝）有高天下之志，兴复洪业，光扬祖宗者，必此主也”，“庠仁常谓其子曰”的“子”，正是指刘显。既然刘显在道武帝6岁时，已经知道他能够复兴祖业，为什么还要等到8年之后再下手。如果要捕捉老虎，不在幼年还要等到它长成壮年吗？所以只有道武帝路过独孤部时，刘显才有谋害的机会。其准确的时间，只能是385年8月去往贺兰部之前。此外，《太祖纪》还记载：“帝乃阴结旧臣长孙健（嵩）、元他等”，可是《太祖纪》已经记载代国初亡时，其旧臣长孙嵩和元他等人，投靠了独孤部刘庠仁。而道武帝在代国初灭时也“转幸独孤部（《太祖纪》）”。既然他们三人几乎同时去了独孤部，

道武帝作为代国王孙，与他们相互之间不可能没有往来。即使道武帝年龄尚小，也不可能完全没有接触的机会，更不需要私下里交往。所以“阴结”二字明显是为了躲避独孤部人的视线，这不符合他们长时间相处在一起的实际情况。当道武帝来到独孤部时，由于他们是代国旧臣，所以必须避开独孤部人的监视，在私下里“阴结”。此外《魏书》还有几条文献，也是从独孤部或贺兰部跟随道武帝的记载。《长孙肥列传》记载：“太祖之在独孤及贺兰部，肥常侍从，御侮左右，太祖深信仗之”。《上谷公纥罗列传》记载：“上谷公纥罗，神元皇帝之曾孙也。初，从太祖自独孤（部）如贺兰部，招集旧户，得三百家，与弟建议，劝贺兰推太祖为主”。《叔孙建列传》记载：“建少以智勇著称。太祖之幸贺兰部，建常从左右”。《李栗列传》也记载：“李栗，雁门人也。昭成时，父祖入国。少辩捷，有才能，兼有将略。初随太祖幸贺兰部，在元从二十一人中”^[12]。所以道武帝重建代国以前的路线是：独孤部→贺兰部→牛川（即位），这条唯一的行动路线，正说明道武帝并非长期活动于独孤部和贺兰部，而是跟随慕容垂奔赴中山，又从中山回归漠北时的经由路线。^[13]



4 重建代国的支持者

道武帝能够顺利地重建代国，究竟获得哪方面的支持，才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呢？道武帝和代王来到长安以后，原代王的势力集团已经瓦解，跟随道武帝回归漠北的成员应该非常有限。当道武帝随同慕容垂回到中山，又踏上北归之路时，先后来到独孤部和贺兰部。然而独孤部已经今非昔比，首领刘显不但不可能提供帮助，甚至还视为竞争对手企图谋害他。在这样的危急情况下，道武帝快速逃向贺兰部。虽然贺兰部是自己的母家，却也有贺染干强烈反对，贺讷的态度也很暧昧（《贺讷列传》）。

道武帝即位以后，主要分封了南部大人长孙嵩和北部大人叔孙普洛（《太祖纪》）。长孙嵩跟随道武帝来贺兰部时，与道武帝是“阴结”的关系，所以只带700家离开独孤部（见前文）。叔孙普洛在登国元年10月，与刘显交战时，在没有遇到敌人的前提下，就与13人投奔了刘卫辰，可见叔孙普洛的力量也并不强大（《太祖纪》）。而登国元年8月，刘显前来攻伐时，“帝虑内难，乃北逾阴山，幸贺兰部，阻山为固（《太祖纪》）”。从这条文献的记载来看，道武帝能够到贺兰部避难，正说明贺讷只是勉强支持道武帝即位，并没有倾全力追随他，更没有带领所有军队离开阴山之北。特别是道武帝只是前去避难，没有向贺兰部搬救兵，这也说明贺兰部不会倾力相助。而且，这次刘显攻伐道武帝时，道武帝最先向慕容垂求救，慕容垂派慕容贺麟助战，该年10月打败刘显派来的窟咄（《太祖纪》）。登国2年5月，道武帝派遣安同向慕容垂征兵，准备攻伐刘显。慕容垂派慕容贺麟前来助战，刘显败走投奔慕容永（《太祖纪》）。登国5年道武帝西征，慕容垂再派慕容贺麟前来助战（《太祖纪》）。根据以上的记载，可以看出，道武帝从登国元年5至5年，每遇强敌或准备讨伐敌军，都是寻求慕容垂的帮助。

但是，随着道武帝的军事力量逐渐增强，兼并后燕慕容垂的野心也开始膨胀。《卫王仪列传》记载：“及太祖将图慕容垂，遣仪观衅。垂问仪太祖不自来之意”。这段话正说明慕容垂与道武帝是君臣关系。因为登国元年慕容垂已经即皇帝位，而道武帝只是代王，并且道武帝能够取得代国政权的稳固，主要依靠慕容垂的军事力量。所以慕容垂才能指责道武帝不亲自前来朝拜的原因。但是，另一方面，当道武帝的军事力量逐渐强大时，也引起了慕容垂的警觉。《魏书·太祖纪》记载：“慕容垂止元觚而求名马，帝绝之。乃遣使于慕容永，永使其大鸿胪慕容钧，奉表劝进尊号”。慕容垂扣留代国使者秦王觚，以索要名马为借口，遭到道武帝的拒绝。由于道武帝凭借自身的力量，还不能与慕容垂抗衡，于是便与慕容永结交。尽管慕容垂和慕容永是叔侄关系，但却是宿敌，慕容永与道武帝联手，完全

是为了共同抗拒慕容垂。而慕容永“劝进尊号”，也是鼓动道武帝摆脱慕容垂自立为帝之意，当然这是慕容永的权谋。但由于二者的联手，既公开表明道武帝与慕容垂决裂。登国9年慕容垂灭掉慕容永之后，双方的战争便不可避免。《太祖纪》记载：“（登国）十年…秋七月，慕容垂遣其子宝来寇五原，造舟收谷”。《资治通鉴·晋纪三十》也记载：“魏王珪叛燕，侵逼附塞诸部。五月甲戌，燕主垂遣太子宝、辽西王农、赵王麟帅众八万自五原伐魏”，虽然两条文献的时间略有差别，但是“魏王珪叛燕”，正说明道武帝原臣服于慕容垂。当慕容垂派其子慕容宝讨伐道武帝时，其结果慕容宝大败。皇始元年3月，慕容垂亲自领兵讨伐道武帝，虽然攻占了平城等地，但不久因病死于军中（《太祖纪》）。

《太祖纪》还记载：“（登国元年）十二月，慕容垂遣使朝贡，奉帝西单于印绶，封上谷王。帝不纳”，“帝不纳”可能未必是实情，因为这时期的道武帝，离不开慕容垂的支持。而慕容垂能够册封道武帝，也说明二者是君臣关系，否则慕容垂没有义务多次帮助道武帝。当慕容垂死去以后，《太祖纪》记载：“（皇始元年）秋七月，右司马许谦上书劝进尊号，帝始建天子旌旗”，正是在强敌慕容垂死去之后，道武帝才敢于称帝。

道武帝从长安跟随慕容垂回归中山，这期间相互交往，甚至道武帝向慕容垂学习的机会一定很多。慕容垂为了巩固自身的力量，在帮助道武帝重建代国的同时，也误认为道武帝会真心臣服于他。但不论阅历还是才能，都不及慕容垂的道武帝，竟然在很短的时间内，军事力量空前强大，最终以慕容垂之死，宣告道武帝的全面胜利。由此可以推论，道武帝能够重建代国，除了一部分代国旧臣以及其它部族的支持之外，恐怕没有慕容垂的军事力量，是不可能顺利即位的。383年10月淝水之战以后，至道武帝重建代国，大约有两年多的时间，这时期少数民族政权相继建立，如果道武帝一直生活在漠北，为什么不在这时重建代国呢？其重要原因就是慕容垂还没有回到中山，道武帝也不在漠北。

5 结论

道武帝能够成功地重建代国，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。淝水之战苻坚失去对华北等地的控制以后，一个个军事割据政权相继产生。其中最强大的军事集团，就是慕容垂的后燕政权。而道武帝正是在慕容垂的全力支持下，才有条件与周边部族进行博弈。重建代国的初期，道武帝面临最大的棘手问题，就是来自部落之间的兼并战争，而此时代国尚在恢复阶段，仅仅凭借自身的军事力量，难以承受大规模战争的考验。在登国元年至登国5年期间，每次遇到强敌犯境，或者准备

讨伐敌人，慕容垂总是极力相助。正是有了慕容垂的支持，道武帝才能度过最危险的草创期。

宋·袁枢《通鉴纪事本末·拓跋兴魏》卷十六下记载：“拓跋珪沈勇有谋，幼历艰难”。由于道武帝幼年遭遇不幸，或许对他是刻骨铭心的记忆，也正是代国曾经被前秦所灭，才有了强烈的复兴愿望。因为长时间生活在长安，苻坚安抚代国的政策，恰好为他提供了安全的避风港。同时，也在长安浓厚的汉文化氛围里，不断学习安定邦国的经验，也为日后重建代国，奠定坚实的基础。相反，代国灭亡以后，如果道武帝依然滞留在游牧部落里，部落之间的矛盾重重，在没有任何势力保护的情况下，随时都可能遭遇杀害的危险，即使侥幸存世，复兴代国的机遇也会非常渺茫。所以，慕容垂能够帮助道武帝重建代国，除了有相互利用的政治目的之外，必然与道武帝有深厚的感情。而道武帝能够取得慕容垂的信任，其渊源应该追溯到长安时期。

注

- [1] 王仲华《魏晋南北朝史·第七章 北朝的政治与经济·第一节 北朝初期的社会性质》（中华书局，2007）、安介生《北魏道武帝早年经历考辨——与李凭先生商榷》（《民族研究》，2002年第4期）、姚宏杰《关于道武帝早年身世的若干问题》（《北京大学学报》，2003年第2期），即有此观点。
- [2] 李凭《北魏平城时代·第一章 皇权初建·第一节 道武帝早年经历考》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，2000），以及周一良《崔浩国史之狱》（《魏晋南北朝史札记》，中华书局，1985），都认为代国灭亡时，代王以及道武帝等人，被前秦掳至长安。最早提出此观点的是志田不动麿《史学杂志》（第48编，2、3号，1937）。
- [3] 根据前田正名的考证，君子津是沿阴山山脉东流入黄河的地方，此处河道狭窄利于渡河。《平城的历史地理学研究》（156页，风间书房，1978）
- [4] 按《魏书·序纪》记载，代王先后娶慕容氏三女为妻。其一，是建国2年（339）娶慕容元真之妹为皇后，建国4年9月崩。建国7年（344）9月娶慕容元真之女为妻，建国23年6月崩。建国25年（362）11月慕容暉祚女备后宫，卒年不详。北魏建国后，追封慕容元真之女为昭成皇后，这也应该是道武帝的祖母。而慕容垂为慕容元真之子，代王与慕容垂为平辈。但其后由于代王与道武帝生活在一起，很可能被史家误认为父子关系，从而，也就进一步将慕容垂与道武帝误认为舅甥关系。以上内容，还参照《魏书·徙何慕容廆·慕容元真列传》《慕容垂列传》
- [5] 参照周一良前揭论文、李凭前揭书36页。
- [6] 有关崔浩被杀的政治事件，历来有很多争议。但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，必然与修国史有一定的关系，参照周一良前揭论文。《魏书·崔浩列传》
- [7] 道武帝“执父”是替人受过的观点，参照李凭前揭书141页。
- [8] 有关道武帝的汉文化素养和重视儒学，参照《魏书·太祖纪》《儒林列传》

- [9] 虽然《晋书》晚出于唐代，但是在此之前，已经有多家史官记载了晋代的历史。参照《隋书·经籍志第二十八》、王鸣盛《十七史商榷·晋书一》
- [10] 《魏书·昭成子孙列传》卷十五校勘记[二]（386页，中华书局，2003）
- [11] 贺氏在22岁生道武帝于371年7月7日，而道武帝之父已经在当年的5月先世，贺氏46岁死于皇始元年（496）。这期间共有24年，他如此年轻，其后再嫁人的可能性很大。周一良认为“秦王觚”很可能是代王和贺氏之子，二者为翁媳婚配的关系。参照周一良前揭论文。《魏书·序纪》《贺皇后列传》《秦王觚列传》
- [12] 张金龙《拓跋珪“元从二十一人”考》（《北朝研究》1995年第1期），对“元从二十一人”进行了详细的考证，这些人也都是道武帝回归漠北时，在独孤部或贺兰部跟随他的。
- [13] 道武帝为何从中山回归漠北时，必须要先去独孤部的原因，主要是中山距离独孤部最近，这也是原代国控制的地区。独孤部的主要活动地点，《北史·刘库仁列传》记载：“刘库仁，字没根，独孤部人。…苻坚以库仁为陵江将军，…令河西属卫辰，河东属库仁”，即独孤部在黄河以东。关于贺兰部的活动地点，《魏书·太祖纪》记载：“登国元年…乃北踰阴山，幸贺兰部”，即贺兰部在阴山之北。有关这时期各主要城市及河川的地理位置，参照谭其骧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（第四册，9—13页，地图出版社，1996）。该表是道武帝在漠北被俘至重回漠北的主要行动路线。参照《晋书·慕容垂载记》、《魏书·太祖纪》

（湛江师范学院）